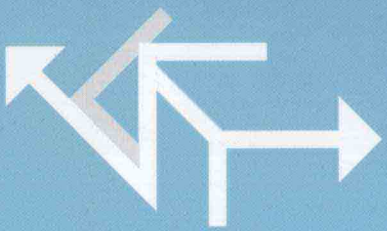
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张雪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张雪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张雪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428-4

Ⅰ. ①知… Ⅱ. ①张… Ⅲ. ①经济学：哲学—研究 Ⅳ. ①F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362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张雪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14,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28-4/B·828

定价 38.00 元

序言

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在这里，作者想就本书的主题做些说明，达此目的，最简便的办法是对本书的名称加以解释。“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这个副题，道出了本书的方法论旨趣：注重对经济理论假设的考察，从分析经济理论的约束条件入手，对主流经济学通行的理论假设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在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开展新的经济解释。循此思路，本书集中发掘和关注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弗兰克·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信念理性假设”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地方性知识假设”或者“默会知识假设”。

这三个替代性假设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高度关注微观经济主体知识的有限性、异质性和默会性，二是高度关注经济世界的深度不确定性，这就为建构经济理论规定了与新古典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约束条件。因此，本书正题取名为“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内容也主要围绕三个“不确定性知识范式”展开。对于正题和三个不确定性知识范式的说明，这是第一章的主要任务。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罗纳德·H. 科斯在他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开篇就指出："经济学理论一直饱受不能清晰阐明其假设之苦。经济学家在建构理论时，经常忽略考察其建立的基础。而这种考察又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为防止理论所依据的假设而产生的误解和无谓争论，还因为，经济学在选择相互竞争的各组假设时做出良好判断极为重要。"①

整整60年后，科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及这段开场白时，还不无遗憾地指出，"我的论文从方法论入手：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做的假设应该是实际的。大多数读者会忽略这些开场白(普特曼在重印我的文章时把它们删掉了)，而另一些人则将这段话视为幼稚的错误加以原谅。因为他们和现代很多经济学家一样，相信我们应该在预测准确的基础上选择我们的理论，至于假设的现实性全然无关。"②

根据科斯的断言，人们对于他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不但对其内容的原创性反应迟缓，以至于在30年之后才为同行们所关注，而且即便是在60年之后，人们还是未能理解他所运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注重对经济理论假设的考察和选择。恐怕直到今天，人们对科斯为什么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定位于对经济理论假设的考察和选择仍然困惑不已。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迄今仍然有很多学者还没有从他们对经济理论的"假设无意识状态"中走出来，因而，很少有学者真正像科斯那样，自觉地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展开批判性的检讨。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变革和革命史，视为一部经济理论假设的演化、修正和更新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由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掀起的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经过马歇尔的综合，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

---

①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vember):386—405.

② 罗纳德·H. 科斯：《企业的性质：意义》，载奥利弗·E. 威廉姆森和西德尼·G. 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页。

③ 参阅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30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革命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引入了一些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充分竞争假设、充分理性假设和充分知识假设以及蕴含在这三个基本假设中的货币中性、制度中性、价值中性、企业同质、要素同质、单一偏好、零交易费用等。①由于这些假设都暗含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因而并没有获得清晰的说明，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科斯指出，“经济学理论一直饱受不能清晰阐明其假设之苦”。

严格说来，边际主义革命之后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含的如此多的假设，做出过认真的说明和深入的检讨。但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感受到科斯谓之的“假设之苦”，一场关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大争论已是不可避免。参与这场大争论的主要学者包括：弗兰克·奈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莱昂内尔·罗宾斯、罗宾逊夫人、哈奇森、马克卢普和罗纳德·H.科斯等。

这其中，或许奈特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问题作专题研究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完全竞争假设”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危机的内在关系，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假设”对“完全竞争假设”做出了重要修正。正如肯尼斯·阿罗所言，“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看来是如此”。②奈特将“不确定性假设”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但预示了此后发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而且预示了不对称信息经济

---

① 这里用充分竞争、充分理性和充分知识而不是完备竞争、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来描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学者认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并不需要如此“完备”的假设才成立，但是，即便是在较弱的意义上来考察一般均衡模型成立的条件，它对竞争、理性和知识的要求，至少必须是“充分”的。

② 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学革命的到来。在我们看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正是科斯以“交易费用假设”替代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的结果。①

科斯对有效的经济学假设提出了两条缺一不可的标准：其一，假设必须易于处理；其二，假设必须是现实的。②按照这两条标准，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虽然具有“现实性”，却没有满足“易于处理”的要求，而“交易费用”作为“不确定性”存在的一种量度，在满足现实性要求的同时，也达到了易于处理的标准。因而，科斯在总结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时强调，科斯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从引入“交易费用假设”开始的，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存在正的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想世界和奈特的不可琢磨的不确定性世界，才能解释企业的存在以及企业和市场的边界。

本书集中研究了三个主流经济理论的替代性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我们认为，正是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阉割了奈特“不确定性假设”中所蕴涵的最具革命性的内容。我们主张从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回归到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重新发现“不确定性

---

① 科斯曾明确表示：“可以确信，奈特对我的企业思想的发展没有影响。”但是他又承认，“后来我还是仔细阅读了奈特的著作，而且毋庸置疑，我后来的论著受其很大的影响，尽管难以说清楚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其影响”。（奥利弗·E. 威廉姆森和西德尼·G. 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60 页）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包括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以及基于交易费用概念而发展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的理论要点，奈特在他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都已经阐述得相当清楚了，只是在奈特这里，“交易费用”只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次级概念”，对企业性质的解释仅仅停留在交易费用的层次，在奈特看来，这是很肤浅的，因而是远远不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② 与科斯不同，弗里德曼在 1953 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论文中，对有效的经济学假设提出的标准是：(1)与一个假说有效性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Friedman, M.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2。学术界围绕这两个标准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史称“假定之战”。参加这场争论的学者，既包括诸如恰尔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又有像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劳伦斯·A. 博兰德(Lawrence A Boland)和布鲁斯·考德维尔(Bruce Caldwell)等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大师，也不缺少恩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和阿兰·马斯格雷夫(Musgrave. A.)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关于弗里德曼假设论点及其争论的一个研究，可参阅李和平《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

假设”的经济理论意义。奈特所谓的不确定性不是一种可概率化的风险，风险总是可以通过保险转化为成本核算，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无知状态是无法预测的；换言之，“偶然性和‘机遇’是一个无法进行分析的自然事实”。[①]在一个虽然存在风险但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里，所有盈利机会都将即刻被发现和利用，既没有利润，也没有企业家，从而也没有企业。循此逻辑推演，奈特认为：不确定性是利润存在的根源；由于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利润也就是企业家的利润，它是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工具就是企业，因而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由此，奈特将正统经济学的“资本家的企业理论”转变为“企业家的企业理论”。

诚然，奈特基于“不确定性假设”而进行的企业解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的核心是对企业家角色的确认，但他并未对如何识别企业家这个关键问题给出合理说明。这正是科斯对奈特提出批判的逻辑原点。我们提出的“企业家识别模型”弥补了奈特企业理论的这一缺环，不但回应了科斯批判，而且展示了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从科斯“交易费用范式”向奈特“不确定性范式”回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凯恩斯革命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充分理性假设。众所周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引论”的开篇就指出：“正如它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样，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古典学派的理论支配着我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这种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我将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

① 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57 年版前言），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46 页。

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凯恩斯的这段话要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要么做了误导性的解读，从而曲解了“凯恩斯革命”的性质。

在《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赫伯特·西蒙对凯恩斯的这段话和《通论》做了如下解释：第一，书中大部分是对新古典分析的一种运用，它的假设和由其推导出的模型也都没有完全脱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因而，“作为主流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不断运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语言来挑战他们的领域”。第二，凯恩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凯恩斯争辩说，在现实里人并不总是十足理性的，他向新古典主义体系的核心——认识完全理性的假设——的实效性发起挑战”。正是在此意义上，西蒙“建议把凯恩斯当作有限理性经济学的鼻祖”。②

我们看到，西蒙对“凯恩斯革命”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他充分认识到，《通论》策动经济学革命的关键，是它对新古典“完全理性假设”的实效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从而向“新古典主义体系的核心”发起了挑战。但是，西蒙对凯恩斯革命的实质的解释是错误的，即认为凯恩斯革命的实质乃是以他所谓的“有限理性假设”替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就像其他很多经济学家一样，西蒙也没有认真追问在凯恩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充分理性假设的同时，是否提出过一个真正属于凯恩斯自己的替代性的经济学假设。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忽视，是导致《通论》中的重重疑团无法得到正确解释的根本原因。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围绕“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之谜”所产生的大量而无谓的争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已经形成一种定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

---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印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 页。有必要指出，凯恩斯在这里所说的“古典学派”包括新古典学派，是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统称。

② 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16 页。

大缺陷是它缺乏一个微观经济学结构。然而，上述定见是在没有考察凯恩斯早期哲学研究成果《概率论》(*Treaties of Probability*, *1921*)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误解。自1904年开始构思至1921年出版，《概率论》是凯恩斯先后用了17年时间进行研究和思索的经典之作。凯恩斯在《概率论》中发展了一种新概率论即逻辑概率理论(the theory of logic probability)，并借此创立了一种新理性观即信念理性理论(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lief)。本书研究的另一个主流经济理论的替代性假设，即凯恩斯在他早期哲学著作《概率论》中提出的“信念理性假设”。凯恩斯的“信念理性”根本不同于西蒙所谓的“有限理性”，也与演化经济学的演化理性、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认知理性、哈耶克基于默会知识的缄默理性以及哲学上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等，均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的研究表明，《概率论》依据“信念理性假设”而建构的“信念理性理论”正是《通论》的微观基础。这样，我们就在《概率论》和《通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凯恩斯思想体系内部解决了《通论》的微观基础问题，从而对于那些试图在凯恩斯思想体系之外寻找和嫁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做法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之谜”这个中外经济思想史中的重大专题给出了新的解答。

本书研究的第三个主流经济理论的替代性假设，是哈耶克的“地方性知识假设”。这里的“地方性知识”通常所指即哈耶克的“默会知识”。如果说凯恩斯的“信念理性”从哲学认识论上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那么，哈耶克的“地方性知识”则是从哲学知识论上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假设。回顾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现代经济学有着关注知识问题的传统，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知识问题的关注则是新近的事情。原因在于，整个主流经济学界长期弥漫着一种“知识的僭妄”，①

① 哈耶克：《知识的僭妄》，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这种“致命的自负”①不但导致了对“理性的滥用”，②而且培养了主流经济学家只“在注脚中讨论知识问题”③的传统。

深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知识问题虚无化的哲学渊源，一个主要的诊断是经济人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现代经济学创立之初，原生态经济人追随的是休谟理性主义传统，它崇尚有限知识，但这一传统在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冲刷下，逐渐颓废、变质了，即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知识假设逐渐替代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知识假设。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由原生态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经济学的“知识骚乱”。④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蜕变史”和“知识转向史”，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主流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知识假设向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知识传统复归，正是哈耶克整个经济哲学思想的核心。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性假设，即“地方性知识假设”。

按照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中给出的定义，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⑤有时也称之为“分散的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⑥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地方性知识就是“分散于不同的人中间、经常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⑦此外，哈耶克在他的《自由宪章》、《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感觉秩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货币的非国家

①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迈克尔·罗斯查尔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论不完备信息经济学》，载谢康和乌家培编：《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④ 哈耶克：《曼德维尔大夫》，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8 页。
⑤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20—123 页。
⑥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87、110 页。
⑦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经济学与知识》、《知识的僭妄》、《理性主义的类型》、《建构主义的错误》、《头脑的两种类型》、《复杂现象论》、《社会主义与科学》等论著中，从不同层面对“地方性知识”的内涵和特征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总体来讲，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与客观知识、普遍知识、确定知识、言传知识和权威知识相对立的知识形态，它具有个体性、默会性、实践性、有限性和不确定性。

根据“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假设，哈耶克重新定义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在他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而分散的个人知识以解释自发秩序生成机制的学问。这样，哈耶克的“地方性知识假设”就把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转变为知识分工、知识配置和知识利用问题，并用“个人知识效用最大化”置换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心理效用最大化”。这是哈耶克整个经济学乃至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核心、最具特色的构成部分，也是他为解释经济科学的性质和任务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哈耶克藉由地方性知识假设告诉我们一个看似矛盾的论断：惟有“有限知识”才是一种“优质”的知识形态。这是因为：首先，有限知识以承认“人类理性疆域的狭隘性”为前提，从而对“知识的僭妄”是一种消解；其次，正是知识在众多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个人自由成为一种必要，武断地以权威知识置换个人知识则是剥夺人类自由的一种惯用手段；最后，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有限知识的存在形态，为解释市场过程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地方性知识假设”具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变革意义和对经济现实的穿透力，但这并不标志着我们就认同了哈耶克基于“地方性知识假设”而建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自由市场乌托邦情结，既是他推行“地方性知识拜物教”的一个必然结果，部分地也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原生过程的错误理解。①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本书所研究的三个替代性假设及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是与我国经济现实关涉在一起的。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启示我们，深度不确定性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我们从事政策选择和推进改革实践的基本约束条件；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为秩序的生成创造了各种可能的形式、路径和空间，这是中国改革总能在不断尝试中摸到“石头”的深层根源。凯恩斯的“信念理性假设”启示我们，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及其行为不断涌现，加强对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探究市场经济的非理性世界，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哈耶克的“地方性知识假设”启示我们，中国的改革和转型之所以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改革和转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逻辑：地方性知识优先于普遍性知识。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盲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提供的现成的“普遍性知识”，而是更为重视中国普通民众的实践智慧，即中国民众的“地方性知识”。

目录

序　言　主流经济理论的三个替代性假设 / 1

第一章　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 / 1

第一节　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由来：经济人的“知识骚乱” / 1

第二节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概率、直觉和信念 / 12

第三节　知识问题与不确定性：当代经济学变革的主题 / 24

第四节　三种不确定性知识范式：研究现状、本书拓展与研究意义 / 35

第二章　不确定性知识范式(Ⅰ)：信念理性与理性选择 / 48

第一节　逻辑概率：一种新知识观 / 49

第二节　信念理性：一种新理性观 / 61

第三节　信念理性与微观基础 / 89

第四节　信念理性与预期理论 / 109

第五节　信念理性与前景理论 / 119

第三章　不确定性知识范式(II)：不确定性与经济组织 / 127

第一节　知识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再反思 / 128

第二节　不确定性：企业理论分析的新起点 / 145

第三节　不确定性与利润起源的企业家解释 / 153

第四节　不确定性与企业组织的企业家解释 / 165

第五节　不确定性与雇佣经理悖论的企业家解释 / 211

第四章 不确定性知识范式(Ⅲ)：默会知识与市场过程 / 220

第一节 RPH-默会知识：一幅人类知识新图景 / 221

第二节 默会知识经济学观—1：经济科学的性质 / 242

第三节 默会知识经济学观—2：方法论个人主义 / 253

第四节 默会知识与财产秩序 / 271

第五节 默会知识与市场过程 / 290

第五章 结语：经济学知识的限度 / 314

第一节 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经济理论：一个总结 / 315

第二节 正统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一个反思 / 328

第三节 经济学应如何把握不确定性：一个展望 / 333

后 记 / 350

第一章

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

现代经济学说史表明，经济理论的每一次大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知识观革命与经济理论变革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揭示出一个有待研究的经济哲学命题：知识问题及其经济学革命意义。

第一节　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由来：经济人的“知识骚乱”

知识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在本书中，我们是在两个层面上定义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的：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传统；第二，不同的知识观传统对经济理论建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是与其理性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考察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个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一个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由此可知，现代经济

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其中隐含着一种逻辑必然：正统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式——经济人——曾经经历了一次大蜕变，这就是经济人的“知识论转向”。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①]我们认为，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蜕变史”和“知识转向史”，正是我们解释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由来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一、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

市场经济思想史表明，原生态经济理性和经济人理念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其贡献主要应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贝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29)、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曼德维尔早斯密约一代人，弗格森被斯密尊称为老师，休谟则是斯密的挚友和文稿遗嘱执行人。他们的思想经由多种渠道特别是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换言之，原生态经济人一开始就从属于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

原生态经济人在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这是一个思想史实。原生态经济人的基本要义是：个人自利行为自发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着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人性自私论解释，二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有限理性论解释。也就是说，经济人思想有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人性自私论；二是理性观，即知识论。前者在整个正统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始终如一，延续至今；后者则发生了本书所说的“知识论转向”。后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

①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